How Does the "Peripheral" Become "Central"?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Intermediaries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Power Structur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He Kun[1], Yang Jingying[2]*

[1] Brest State A.S. Pushkin University, Brest 224016, Belarus

[2]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intermediaries are commonly understood as functional actors that connect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occupying a relatively peripheral position within global educational mobility structures. While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examined their market behaviors at micro or case-based levels, this paper adopts a macro-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how these intermediaries reshape their roles within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nd power configurations. Integrating Bourdieu's field theory with Foucault's discourse–power framework, the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model of "field–discourse–legitimacy"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eripheral adaptation to explain how intermediar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mmonwealth–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engage in differentiated discursive practices toward multiple power actors to facilitate capital conversion and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rmediary discourse should not be regarded merely as commercial expression; rather, it constitutes an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 embedded within global knowledge–power structures. The relative movement from "periphery" to "center" reflects the growing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intermediaries; Peripheral adaptation; Discourse strategy; Power negoti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cro analysis

"边缘"何以"中心化"?——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跨国教育中介与权力结构变迁

贺琨[1] 杨婧滢[2*]

[1]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白俄罗斯·布列斯特 224016

[2] 澳门城市大学，中国·澳门 999078

摘 要：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教育中介通常被理解为连接高校与学生的功能性行动者，处于全球教育流动结构中的相对边缘位置。相较于既有研究多从个案或微观层面讨论中介的市场行为，本文尝试从宏观理论视角审视跨国教育中介如何在特定制度与权力结构中实现角色重塑。文章整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与福柯的话语—权力视角，构建"场域——话语——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并提出"边缘性调适"这一解释性概念，用以分析跨国教育中介在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场域中，如何通过面向不同权力主体的差异化话语实践，推动资本转换与合法性建构。研究指出，中介的话语实践并非单纯的商业表达，而是嵌入全球知识与权力结构之中的制度化行动，其由"边缘"向"中心"的位置变化，反映出非国家行动者在国际教育治理结构中日益增强的参与度与影响力。

关键词：跨国教育中介；边缘性调适；话语策略；权力博弈；高等教育国际化；宏观分析

1 引言：全球化教育市场中的"边缘"行动者及其崛起

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已从以人员与知识流动为主的合作形态，逐步转向深度嵌入市场逻辑的制度化进程[1]。在这一背景下，英联邦国家凭借既有的学术声誉、语言优势以及以教育出口为导向的政策安排，逐渐形成面向中国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集群。近年统计显示，中国学生已成为英联邦主要留学目的国中的重要国际学生群体。以英国为例，中国学生规模长期位居各国国际学生前列，其带来的教育相关经济贡献

已达百亿英镑量级[2-3]。围绕这一持续扩张的跨国教育流动网络，英联邦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形式不断深化，既包括传统的留学输出，也涵盖合作办学、联合科研平台等多种制度安排。相关数据从学生规模、经济贡献、合作项目数量以及中介市场发展等多个维度，呈现出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高度市场化与专业化的结构特征。表1对这一合作格局的关键指标进行了概括性呈现，为理解跨国教育中介所处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必要背景。

表1 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核心数据可视化

指标	具体数据
中国在英联邦留学生规模（2024-2025）	58 万人，占英联邦国际学生总数 32%
中国学生对英联邦教育产业贡献	年超 120 亿英镑
英联邦国家在华留学目的地排名	核心四国连续 8 年位列前十
中英联邦合作办学专案数（2024）	超 2300 个（含学历专案、联合科研平台等）
跨国教育中介市场规模（中国）	2024 年约 480 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 15.2%，其中 62% 业务聚焦英联邦国家
中国在英联邦留学生规模（2024-2025）	58 万人，占英联邦国际学生总数 32%

在这一庞大而复杂的流动体系中，一类非国家行动者——跨国教育中介——逐渐显现出其结构性重要性。既有研究多将其理解为连接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信息“桥梁”，或在更为批判的视角下，将其视为加剧教育商品化与信息不对称的“掮客”[4-5]。政策话语与学术讨论中对中介角色的分歧，恰恰反映了其在全球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与动态性。

基于此，本文试图提出并回应一个宏观层面的理论问题：在结构性力量占据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场域中，原本被视为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跨国教育中介，如何通过持续的话语实践与制度互动，逐步获得合法性与影响力，并重塑其在跨国教育流动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2 理论透镜：场域、话语与“边缘性调适”分析框架

2.1 作为结构性空间的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场域

布迪厄将场域界定为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结构性空间，不同行动者围绕稀缺资本展开持续博弈，其位置由资本类型及其分布状况所决定[6]。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正构成这样一个多层嵌套的场域：英联邦国家政府与高校在学术认证、制度规则与象征声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政府通过政策规制与制度准入对跨国教育活动形成关键约束；学生及家庭则以消费能力与升学需求参与其中。

在这一结构性空间中，跨国教育中介通常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其初始资本主要表现为信息资本与有限的关系资本，而在文化资本、制度资本与象征资本方面并不占优势[7]。与此同时，中介的行动还受到全球大学排名体系、行业规范以及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等超国家力量的持续影响。这些多重约束共同构成了中介开展实践时所面临的结构性条件。

2.2 话语作为权力博弈的核心载体

福柯指出，话语并非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通过建构知识、界定“真理”来塑造社会关系的权力实践[8]。在跨国教育中介的运作过程中，各类沟通与表达形式——包括宣传文本、咨询话术、谈判语言与行业报告——均构成具体的话语实践。

这些话语实践并非中立的信息传递，而是服务于合法性争取与资源获取的策略性行动。中介通过反复建构“优质教育”“成功路径”“风险控制”等叙事，试图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建立可信性与正当性，从而扩大其在场域中的行动空间。话语由此成为连接结构性位置与实际行动的重要中介，使中介得以在既有权力格局中进行策略性运作。

2.3 核心概念：“边缘性调适”

在上述结构条件与话语实践的交互作用中，仅以“去边缘化”或“中心化”来描述跨国教育中介的角色变化，难以准确把握其行动逻辑。基于此，本文提出“边缘性调适”这一解释性概念，用以刻画中介作为边缘行动者，在既有权力结构中通过持续调整自身实践以优化位置的过程。

所谓“边缘性调适”，是指中介在承认场域基本规则不变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权力主体的诉求与约束，进行动态、策略性的话语与实践调整。其核心并非颠覆既有结构，而是通过信息资本与关系资本向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的逐步转换，争取更为有利的行动空间。表2 对“边缘性调适”与“去边缘化”两种路径的关键差异进行了区分，有助于明确本文所采取的分析立场。

表2 边缘性调適與去边缘化的核心差异

维度	边缘性调适	去边缘化
核心目标	适应场域规则，在现有权力结构中争取最优位置	打破现有权力结构，实现从边缘到核心的地位跃迁
实践逻辑	策略性妥协与动态适配，强调“顺势而为”	突破性变革与资源重构，强调“主动突围”
行动特征	过程性、持续性、灵活性，无固定终点	结果导向、阶段性、突破性，以地位提升为标志
场域关系	尊重现有权力格局，侧重协调与适配	挑战现有权力格局，侧重重构与博弈

3 话语策略三重维度下的中介“边缘性调适”实践

跨国教育中介的“边缘性调适”并非抽象的结构判断，而是具体体现在其针对不同权力主体所展开的差异化话语实践之中。这些话语实践构成了中介争取合法性与行动空间的核心机制，其共同特征在于：并不挑战既有制度规则，而是通过顺应并重述主导价值逻辑，使自身嵌入既有权力结构之内。

3.1 面向学生及家庭：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管理的选择风险

在面向学生及家庭的交流中，中介首先面对的是高度信息不对称与情绪化决策的情境。其话语实践的关键，并不在于提供完整的信息，而在于重构教育选择的认知框架。复杂、多维的留学决策过程被转化为一种可计算、可比较的“风险——收益”问题，从而降低学生与家庭对不确定性的感知。

在这一过程中，中介一方面持续强化英联邦高等教育的稀缺性与回报预期，通过反复援引QS、THE等全球大学排名，以及“高薪就业”“海归政策红利”等案例，将名校录取与个人成功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因果联结。另一方面，中介又通过不断命名并承诺化解各类“风险”，如学术背景不足、签证不确定性或跨文化适应问题，将自身塑造为不可替代的专业主体。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对教育选择的依赖逐步从高校与制度本身，转移至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体系之中。

3.2 面向英联邦高校：市场拓展与风险控制之间寻找代理位置

在与英联邦高校的互动中，中介的话语重心发生了明显转移。此时，其首要目标并非吸引个体消费者，而是争取来自高校层面的制度化认可。在这一语境下，中介将自身定位为连接中国教育市场与海外招生体系的关键节点，强调其在信息筛选、需求识别与招生效率方面的专业优势。

中介通过提供所谓的“本土市场洞察”与“精准生源分析”，向高校展示其在中国复杂教育环境中的不可替代性，并承诺输送学术条件达标且具备稳定支付能力的学生群体。同时，在各国对跨国招生监管日益严格的背景下，中介还强调其在材料审核、背景核查等方面的内部流程，将自身塑造为高校招生体系中的前置过滤器。这种话语实践并未挑战高校在学术评价上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分担风险与责任，争取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获得更稳定的合作位置。

3.3 面向中英政府：通过政策对齐重塑商业行为的合法性

当面对中英两国政府及其监管体系时，中介的话语策略进一步转向合规性与公共价值的强调。中介通过主动引用并展示其对相关政策框架的遵循，如中国的留学中介管理制度或英联邦国家的授权代理机制，强化自身运营的合法性与透明度，以回应政府对市场秩序与风险防控的关切。

更为重要的是，中介试图将自身商业活动嵌入国家层面的宏观叙事之中。对中国而言，其业务被描述为服务教育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对英联邦国家而言，则被包装为推动教育出口、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支点。通过这种策略性话语重述，中介并未否认自身的商业属性，而是努力将其转译为符合国家政策目标的“生态贡献者”，从而在监管结构中争取更大的行动空间。

4 从“边缘”到“中心”：合法性积累与场域位置的再配置

通过前述多维话语实践的持续展开，跨国教育中介并非以断裂性的方式改变其结构位置，而是在既有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合法性资源的积累与再配置。这一过程体现的并非简单的“中心化跃迁”，而是一种依托资本转换与制度嵌入实现的相对位置调整。

4.1 合法性资源的渐进式累积

中介的话语实践首先表现为符号资本的持续生产与沉淀。面向学生及家庭的话语，有助于中介建立专业性与可信度，从而在高度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获得信任；面向英联邦高校的交流，则强调其渠道价值与风险分担能力，使其逐渐被纳入招生体系的合作网络；而在政策语境中，对合规性与公共贡献的反复强

调，则为中介争取制度层面的认可提供了话语基础。

这些不同来源的符号资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场域运作中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中介得以持续参与跨国教育流动的合法性条件。正是通过这种多向度的合法性积累，中介逐步摆脱了纯粹“中介服务者”的边缘形象，获得了更为稳定的行动空间。

4.2 资本转换与场域位置的相对迁移

在合法性资源积累的基础上，中介进一步实现了多种资本之间的转换。符号资本的提升吸引了更多学生群体的信任，从而转化为稳定的消费资本；同时，这种市场吸引力也增强了其在与高校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使其能够接入更具制度含量的关系资本与文化资本。最终，这些资本以佣金、服务费等形式沉淀为经济资本，反过来支撑中介扩大规模与强化网络布局。

随着经济资本与关系网络的扩展，部分中介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它们不再仅仅执行既定规则，而是在招生节奏、生源配置乃至行业规范讨论中获得有限但实际的影响力。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既有权力结构的颠覆，而更接近于一种“被纳入式的中心化”，即在不挑战场域基本规则的前提下，逐步靠近决策与资源分配的核心位置。

4.3 对跨国教育生态的结构性影响

中介场域位置的变化，对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生态产生了多重结构性影响。中介在信息整合与流程协调上的作用，客观上提高了跨国教育流动的效率与规模；同时其高度依赖排名与市场逻辑的话语实践，也可能在无意中再生产以英联邦为核心的全球知识等级结构，从而强化既有的中心—边缘格局[9]。

表3 跨国教育中介的类型划分

划分维度	具体类型	核心特征
合作授权属性	官方授权中介	获得英联邦高校或教育部门正式认证，签订合作协议，服务流程标准化
	非授权中介	无官方认证，通过市场化运作对接资源，服务灵活但合规性风险较高
服务业务范围	全链条服务中介	覆盖院校选择、材料撰写、签证办理、行前培训、海外生活支持等全流程
	专项服务中介	聚焦单一业务（如高端院校申请、语言培训衔接、签证办理），专业性强
组织形态	大型连锁中介	跨区域布局，品牌化运营，资源整合能力强（如 IDP、启德等）
	中小型特色中介	聚焦细分领域（如特定英联邦国家、特定学科），灵活性与针对性强

与此同时，中介自身内部也呈现出明显分化趋势。随着资本与话语资源向头部机构集中，大型连锁中介更容易获得高校授权并占据优质生源通道，从而在跨国教育产业链中形成新的权力层级。表3对不同类型跨国教育中介的组织形态与运作特征进行了概括，显示出中介“中心化”过程并非普遍发生，而是伴随着新的不平等结构的生成。

5 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文从宏观理论视角出发，讨论了跨国教育中介在英联邦对华高等教育合作场域中的位置变化及其实现机制。分析表明，中介并非通过对既有权力结构的直接挑战实现角色跃迁，而是借助持续的话语实践，在顺应场域规则的过程中积累合法性资源，并通过资本转换逐步拓展其行动空间。“边缘性调适”由此可被理解为一种嵌入既有制度框架之内的策略性实践，其结果并非彻底的结构颠覆，而是相对位置的重新配置。

这一过程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中介在信息整合、流程协调与风险分担方面的作用，客观上提高了跨国教育流动的效率，使更多行动者得以进入原本高度不透明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其高度依赖排名与市场逻辑的话语实践，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既有的知识等级结构，并引入新的权力分化与不平等形式。中介的“中心化”因此并非单向度的进步过程，而是伴随着结构性张力的再生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跨国教育中介的角色变化提示我们，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除国家与高校之外，一类活跃于制度缝隙之中的“中间层”行动者正逐渐获得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理解其话语实践与权力运作方式，有助于更为细致地把握全球教育流动中权力如何被重组、被调适以及被再生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KNIGHT J. Three generations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New developments, issues and challenges[C]//STREITWIESER B.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global mobility. Oxford: Symposium Books, 2014: 43-58.

[2]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statistics: UK[EB/OL]. https://www.hesa.ac.uk/data-and-analysis/students, [2026-01-23].

[3]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and Trad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2023

update[EB/O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education-strategy-2023-update, 2023-05-26[2026-01-23].
[4]BÖHM A, DAVIS D, MEARES D, et al. Global student mobility 2025: Forecasts of the global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R]. Canberra: IDP Education Australia, 2002.
[5]RAGHURAM P. Interjecting the geographies of skills into international skilled migration research: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ics for a renewed research agenda[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1, 27(5): e2463.
[6]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7]MARGINSON 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 good[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21.
[8]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9]ALTBACH P G, REISBERG L, RUMBLEY L E. Tracking a global academic revolution[J].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2010, 42(2): 30-39.